

# 译者角色化与翻译社会化

## ——周煦良译者行为研究

马冬梅

(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50)

**摘要:**在周煦良翻译活动的早期,他以诗人的身份译诗,在选材上虽然以“求真”的文学性文本诗歌为主,策略上却出于“新诗诗体建设”务实之需而采用了一些变通方法;在翻译活动的中期,他带有明显的“制度化译者”色彩,在选材上意志性(自主性)受限,策略上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务实之需采用了全译和变译相结合的策略;在翻译活动的后期,他作为学者的语言性译者角色占据主导地位,在选材上自主性明显提升,虽然仍有“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务实之需,但策略上采用了以求真为本的深度翻译策略。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译者角色化;翻译社会化;周煦良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6-0123-09

## 0 引言

周煦良从1934年开始着手翻译,翻译生涯跨越近半个世纪,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哲学、美学、逻辑学、文艺理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译介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总结自己翻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翻译理论文章和译序。因译著厚重,思想深邃,他的作品入选多部译家研究论著,其中包括我国译家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翻译家研究》,他被称为“地道的文理兼容的翻译家”(方梦之等,2018:69)。方梦之等(2016:2)学者呼吁,“必须挖掘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科学昌盛等密切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掩蔽的重要史实”,其中重点提到了周煦良。卞之琳(2007:417)曾在追忆周煦良的一篇文章中评价周煦良“基本上是书生,却有活动能耐,一贯以行动支持社会、国家进步、正义大业”,袁筱一(2021)后来在《翻译的历

收稿日期:2024-06-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合译研究”(20XJC740004)、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雪漠作品外译与河西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2023A-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冬梅,女,兰州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马冬梅.译者角色化与翻译社会化——周煦良译者行为研究[J].外国语文,2024(6):123-131.

史与翻译的地理》一文中写道：“翻译应该也是周煦良诸多行动之一。”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周煦良的翻译活动展开研究，考察其翻译行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之间的互动，为新时代译者如何将个人学术追求与国家发展需要相结合，发挥翻译的社会效应提供启发。

周煦良的翻译实践涉及众多领域，且涵盖多种形式。从翻译类别来看，既有直接译自英语的作品，也有大量转译自俄语、德语、法语的作品；从译者模式来看，既有独译，也有合译，还有校译；从内容提取方式来看，既有典型翻译（如全译），也有非典型翻译（如变译）。此外，其翻译活动体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选材上经历了自然科学翻译过渡到文学翻译，文学翻译过渡到社会科学翻译，再到社会科学翻译与文学翻译并重这三个阶段，译本表达上既有语言性的翻译行为特征，又有社会性的非翻译行为痕迹。那么，在周煦良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翻译形态为何会如此多元？翻译选材为何会出现多次转向？译本为何会呈现差异化特征？他又是如何以翻译行动支持国家进步和正义大业的？把译者视为存在于社会的意志体，专注于译者的身份和角色之于译文选择的影响，进而考察译者行为合理度的行为批评视域，或许能够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 1 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译者身份、译者角色与翻译选择

译者行为批评是“对译者借助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周领顺，2014:26），也即译者角色化研究。该理论“基于翻译活动从文本中心向社会活动转向这一发展，基于翻译实践存在翻译内部行为痕迹和翻译外部社会行为痕迹这一分析，以及基于把译者行为定位于既具有语言内部行为又具有社会外部行为的一种文化行为这一认识”（周领顺，2022a:79），认为译者兼具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属性和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属性；文本生成既受到译内环境的影响，也受到译外环境的制约；译者行为随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征，该特征在译文中亦有所反映。具体而言，译者的译者身份越高，其语言性越强，译文的求真度就越高；反之，译者的角色化（即社会化）程度越高，其社会性越强，译文的务实度越高，译者的角色化总体上又受制于社会环境。据此，其首创者周领顺教授提出了“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构建了由“译者中心”和“社会中心”构成的双中心“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以“共同服务于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并最终形成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总的理论评价系统”（周领顺，2022b:2），从而描述译者行为的合理度，解释译者行为的合理性。因此，评价译者行为须将特定社会环境下译者身份及其扮演的角色联系起来，毕竟“辨析译者的‘身份’和‘角色’有助于认清翻译性质和翻译活动的性质，……从而增强翻译批评的公正性”（周领顺，2014:229）。

译者行为批评为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提供了一个聚焦翻译现实和译者行为的分析框

架”(傅敬民,2022:23)。根据该理论,译者在译者这一稳定身份的支配下,可扮演包括基本层语言性语码转换角色在内的“译者角色”和任何其他社会性角色。角色化程度决定着译文“译”与“非译”的属性,是影响其行为多元化和译文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故从身份类型切入研究,是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由于“任何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行为活动,还是作为一种产品,都不可避免地深嵌于社会环境之中”(Wolf,2007:1),且“真实的意义需要放在‘活动’‘语境’或‘社会’中考察”(陈静等,2022:5),对译者身份及其角色化的分析,首先应从考察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开始。只有发现翻译现象背后的东西,认识译文的生成环境,才能揭示周煦良在翻译选择时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化非译行为的形式和动因。

## 2 社会环境与周煦良身份角色的嬗变

周煦良的译者身份毋庸置疑,但译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然会为了使译文满足某种需要而调整 and 改变自己的行为角色,从而实现其翻译的社会化,以参与社会进程。根据迥然不同的时代主题和学术环境以及不同的翻译需要,我们可以把周煦良的翻译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4年从事翻译活动以来,到1948年《西罗普郡少年》翻译的完成;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7年;第三阶段,改革开放至其逝世的6年。他在三个时期不同的角色特征和翻译选择,都体现了他不同的务实目的。

### 2.1 诗人译者与周煦良翻译行为的文学参与

虽然周煦良的翻译活动始于物理学著作的翻译,但由于其自身的学术兴趣、交往的文化空间以及中国新诗发展的现实,在翻译完《神秘的宇宙》之后,他的翻译重心迅速转移到了诗歌。自1932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周煦良曾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英国文学兴趣浓厚,尤其是诗歌。1934至1935年间,他经常参加朱光潜家的读诗会,与梁宗岱、李健吾、孙大雨、朱光潜、卞之琳、何其芳、林徽因等人一起读诗,就新诗建设等文艺问题展开学术交流。1936年,他受到戴望舒先生的邀请,成为《新诗》月刊的撰稿人。据笔者统计,在《新诗》共10期的93名作者中,周煦良发表原创诗歌五首,译诗七首,译诗歌理论文章六篇,其译诗及论文数量仅次于戴望舒,远超过其他撰稿人。在1930—1940年间,中国新诗因承载抗日救亡的社会责任而带有强烈的世俗化色彩,出现过度散文化和大众化的流弊,而在自身的艺术建构上,也显得十分乏力。《新诗》创办的初衷是为了使当时枯萎的中国诗坛繁荣起来,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寻求出路。周煦良接受其邀请,并积极参与其中,原因或许正如袁筱一(2021)所说:“周煦良是诗人,家学渊源的原故,对旧体诗很有心得,但在对新文化的坚定信仰中又拒绝写旧体诗,只坚持用译诗的方式找寻新诗的可能性。”

抗战时期中国新诗过度散文化的现状、周煦良本人的诗人身份以及他对通过翻译西方

诗歌为新诗寻求突破这一路径的认同,为他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择定下了基调。在《新诗》停办后,他依然致力于诗歌、诗论翻译,并将诗歌翻译视为中国新诗格律试验的重要途径。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历时十年翻译的《西罗普郡少年》,因为豪斯曼的诗“往往以极平常的字句,极普通的语调,写出一点极微妙的诗意,同时能收极完美的效果”(梁实秋,1936:113),其平实朴素的语言、不事雕琢的风格、严谨整饬的格律以及鲜明的节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新诗诗体试验的需求。作为诗人,周煦良首先关注的是中国文学(新诗)发展的需求,他的翻译选择也体现了诗体建设这一文学需要。译者的角色化过程也是其翻译活动服务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他在这一阶段的诗歌翻译活动就是出于“中国新诗诗体建设”务实之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新诗,或者说新文艺,是大量的周煦良们努力的结果”(袁筱一,2021)。

## 2.2 制度化译者与周煦良翻译行为的政治参与

1951—1957年间,周煦良担任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主任,从事英国文学的教学工作,其翻译重心仍在文学上。众所周知,1949年后全国的翻译工作都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下设的翻译局统一指导,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和重组,至1953年,形成了“两社一刊”<sup>①</sup>的翻译出版格局。高度体制化的翻译出版格局对翻译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翻译的‘赞助’系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里”(查明建,2004:89),选材上受到“两为”方针(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观的制约,经历了从一边倒地偏向苏联到批判地译介苏联文学与大量译介亚非拉弱小民族文学的转变。翻译活动的高度体制化,使译者的主体性被遮蔽,大多数译者带有“制度化译者”的色彩。周煦良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选材标准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转译了五部苏联文学作品,合译了一部东德作家作品和一部保加利亚诗集,作品或由后来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民营出版社出版,或直接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8年他被调往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主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以下简称《文摘》),此后,他的翻译重心转向了社会科学著作。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身份是带有“制度化译者”色彩的译者,那么自任职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以来,他成了典型的“制度化译者”,具有“‘译者’和保证国家政治价值的‘国家公务员’的双重角色”(高玉霞,2016:130)。《文摘》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1958年9月创办的内部刊物,目的在于介绍西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情况,使国人在短时间内集中、系统地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为反帝、反修和批判资本主义提供资料。周煦良负责选稿、审稿、译稿和改稿。其间,他本人也译介了120多篇社会科学文献,为我国学术界提供学术情报,同时还参与了部分

<sup>①</sup> 成立于1951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并于1958年更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于1953年的《译文》杂志。

“皮书”<sup>①</sup>的翻译。可见,其“公务员”角色凸显,是典型的“制度化译者”,翻译选择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参与特点。

### 2.3 学者型译者与周煦良翻译行为的文化参与

新中国成立后的 27 年间,周煦良虽然担任公职甚多,包括上海外文学会副会长等职,但由于长期卧病,他住在上海华东医院。他在病榻上仍笔耕不辍,潜心于学术工作,尤其是翻译。1978 年以来,我国翻译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逐步展开,对外交流迅速增加,文化视野骤然拓宽,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解读,我国的翻译活动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蓬勃发展时期。在社科著作方面,翻译出版活动恢复且迅速发展,试图通过全面译介和重新评价西方文化,以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新文化,对人道主义的重新认识和翻译就是表现之一。1980 年代,我国出现了包括“萨特热”在内的“西学热”,周煦良应《外国文艺》之邀,翻译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刊载于 1980 年第五期的“萨特纪念”专栏。在文学作品方面,翻译选材趋向多元化,各级出版社纷纷推出丛书、丛刊系列,翻译西学经典,以满足日益多元的社会阶层对文化的多元化需求。过去被视为颓废文学、低级趣味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成为文学译介的重点。毛姆作为连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重要一环,也在时隔 30 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文学界的选择视野。自 1979 年以来,《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江南》等刊物陆续刊行毛姆的译作,掀起了毛姆译介的热潮。1982 年,周煦良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翻译了《刀锋》。毛姆善于以冷静客观的笔调来剖析人性的复杂与扭曲,这正好契合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人们对荒诞时代人性进行反思的语境。毛姆对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谨慎尝试,为我国 1980 年代的文艺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可以说,周煦良的毛姆翻译是新中国试验新文学的重要实践。

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和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使得翻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本体,相较于上一时期,译者的语言人属性增强,译者角色凸显。赞助人对翻译选材虽然仍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但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倾向参与翻译选择。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的待译作品中,《刀锋》就是周煦良基于自己对毛姆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文化转型时期读者阅读需求的把握,与赞助人共同商议所定。人道主义作品的翻译,构成了当时新启蒙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时期周煦良的翻译行为具有明显的文化参与性特点。

① 自 1957 年开始,中国就开始选择一部分作品,其中既有苏联的,也有西欧及美国的,当作反面教材和“毒草”,以“内部出版”的形式发行,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称作“皮书”。“皮书”包括“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蓝皮书”“绿皮书”等,其中以“灰皮书”和“黄皮书”居多。“灰皮书”主要收录社会科学论著,“黄皮书”主要收录“修正主义”文学作品。

### 3 翻译行为的社会化与周煦良的译本表达

译者角色化是译者行为社会化的反映,而其行为特征会体现于译文之中,“译者角色化由‘求真’走向‘务实’的过程,是译文从典型翻译(传统上的正统翻译、正法翻译)到非典型翻译(如摘译、编译、等翻译变体、非正法翻译)的过程”(周领顺,2014:229)。在不同的阶段,周煦良的角色化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倾向不同,其翻译行为的社会化程度不同,译本也呈现出了不同特征。

#### 3.1 “新诗诗体建设”的务实变通翻译

前文已论及,在周煦良翻译的第一个阶段,其重要成果在于诗歌翻译。诗歌是典型的文学型文本,对这类文本的翻译,译者通常“以对‘作者/原文’的‘求真’为主,以尽可能保全原文主要信息之真的翻译策略为上”(周领顺,2014:179)。周煦良提出了“意义抑效果、得句定基调”的原则,意义抑效果是指不能为了迁就原诗格律而损害意义的传递。他说:“不管诗表现的是意境,是感受,是印象,它总有一个整体,一个中心思想或者主题……诗的每一部分、每一句都应当为这个主题服务,而我们讲求效果,也仍是为主题思想服务。”(周煦良,2007a:55)“得句”是指那些最能传达原诗神韵的句子,周煦良认为“译诗最最需要抓的是这个,什么格律和押韵问题都只能放在次要来考虑”(周煦良,2007a:47)。

可见,周煦良的诗歌翻译首先是求真为上的翻译。然而,“目标导向下的求真行为全都是务实行为”(周领顺,2024:88)。周煦良(2007a:237)诗歌翻译有明确的务实目的,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借译诗试图建立中国新诗的格律。”他将诗歌翻译视为新诗诗体建设的试验田,因此,他在翻译时并没有完全照搬原诗的形式特征,而是在尽量移植原诗格律的同时,兼顾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融合了林庚提出的“半逗律”和我国的传统声律“平仄律”,在新的时空语境下对原诗的形式进行了微调。根据“求真—务实”的思想,译者偏离作者/原文,可能是出于个人务实的目的。周煦良“借译诗以试验中国新诗格律”的务实目的,决定了他在求真的前提下,做了一些变通的处理,偏离了原文的部分形式特征。

#### 3.2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务实全译和变译

在周煦良翻译活动的第二个时期,翻译活动几乎全部由国家这一隐形赞助人决定,译者选择空间受到限制,带有明显的“制度化译者”特点。为了务“文艺为政治服务”之实,他在翻译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选材标准的《福尔赛世家》时,采用了全译这一求真策略,以全面呈现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现实的揭示和对资产阶级虚伪本性的批判。同时,以转译的方式,翻译了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讴歌社会主义、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及

抨击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顽疾的苏联文学作品。在这些转译作品中,有大量的“非译”痕迹,包括以“译序”“译本内容提要”“译后记”等形式出现的副文本,突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讴歌,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赞美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宣传等。

自1958年调任《文摘》副主编之后,周煦良的翻译重心转向社会科学翻译。该刊物创办的宗旨就是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以多、快、好、省的方法,用五年左右时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领导权,从而使学术事业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引导学术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破‘资’立‘无’”(也闻,1958:79)。为了满足特定条件下的“多、快、好、省”的特殊需求,周煦良主要采用摘译这一变译策略,从巴斯摩尔的《哲学百年》中摘译出的《近代西方逻辑学发展纲要》以及在《文摘》上发表的120多篇译文都属于这类非完整性翻译实践。由于译者角色化和翻译社会化程度的增强,译文中非译的成分逐渐增多。他在《文摘》上发表的译文前面,大多都附有“编者按”,或对符合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予以褒奖,以肯定其积极意义,或不符合意识形态的理论思想予以贬抑,以限制其消极意义。明显的“非译”痕迹,再次证明“翻译的目的性越强,社会性活动的意味就越足。译者的译者身份特征就越弱,而其他的社会角色特征就越明晰化,译者不是纯粹的译者,译文也不会是纯粹的译文”(周领顺,2014:73)。

### 3.3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度务实翻译

在周煦良翻译活动的第三个阶段,文艺创作和翻译活动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似前一时期盛行,宽松的文艺政策也为文艺工作者“松了绑”,赋予了他们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允许文艺工作者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开展文学艺术创作和传播交流。再者,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希冀借助西方各种“理论”和“主义”,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寻找出路,同时也急切地希望向遭遇“书荒”的读者呈现20世纪世界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翻译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本体,允许译者能够把目光投向作品本身的价值。

翻译活动的本体回归,使得译者的语言性凸显,其翻译行为也偏向于求真一端。周煦良在翻译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毛姆的《刀锋》时,在译文提取方式上都选择全译,语言性“翻译”成色增加,完整呈现了两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在具体策略上,采用典型的学术翻译策略“深度翻译”,添加大量的注释,或阐释存在主义的相关专业术语和思想学说,或说明《刀锋》中出现的神话寓言和典故俗语,以重构原文文化语境,填补读者的认知空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传真。两部译作中也都有译者序,但与上一时

期的编者按不同,这一时期的译者序主要聚焦作品自身,周煦良(2007b:507)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译序结尾处写道:“以上是综述本文的大意,并就其本身略作评述,以供读者研究萨特全部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其在文学上表现的参考。”他为《刀锋》撰写的上万字译者序,主要是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翻译方法策略的说明,也是毛姆研究和翻译研究的重要话语资源。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者的译者身份倾向决定了“译”的成分的高低。由上述分析发现,“译”与“非译”的倾向,不仅体现于正文本,也体现于副文本。

#### 4 结语

“译者的角色不同,角色行为自然也不同;角色行为不同,译文呈现的特征也不同。”(周领顺,2014:221)在20世纪三个时期的不同翻译环境下,周煦良角色化及其翻译行为社会化的不同程度,决定了他在翻译对象和翻译策略两个层面的不同翻译选择。在他翻译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为了“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务实之需,他选择了“诗歌”这一典型的文学型文本,翻译时采取了求真性务实的变通策略;在第二个阶段,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务实之需,他选择了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和能够满足特定时期“批判”需求的社科文献翻译,采用全译和变译相结合的策略;在第三个时期,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务实之需,他选择了顺应人道主义思潮的萨特作品和带有现代主义气息的毛姆作品,采用了务实性求真的深度翻译策略。

社会务实是翻译活动的根本动力源,翻译需要是翻译行为的直接刺激源,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促进文明交流是翻译工作的应有之义。三个阶段角色化程度的差异以及译本在求真、务实上的倾向,是周煦良对三个时期不同翻译需要的积极回应使然。他希望依托自己的翻译家身份,借助译者角色化和翻译行为的社会化,关注现实,参与社会进程,发挥翻译活动的社会效应,因为他把翻译作为一种民族复兴的使命,“他不是一个小文人,他是个大文人”<sup>①</sup>。

#### 参考文献:

- Wolf, Michaela. 2007. Introdu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G]//Michaela Wolf & Alexandr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卞之琳. 2007. 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先生[M]//周煦良. 周煦良文集:卷1.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① 2020年,华东师大外语学院为献礼华东师大建校70周年,拍摄制作纪录片《丽娃河畔的翻译家》,追寻大师足迹,传承精神文脉。在该纪录片中,梁超群教授说“周煦良是中国现代转型大潮的重要部分,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意识。他把翻译作为一种民族复兴的使命,他是一个有巨大的思想张力的人。他不是一个小文人,他是个大文人”。

417-427.

- 陈静,周领顺. 2022. 译者行为研究新发展和新思维——周领顺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1):1-11.
- 方梦之,傅敬民. 2018. 振兴科学翻译史的研究——应用翻译研究有待拓展的领域[J]. 外国语(3):67-75.
- 方梦之,庄智象. 2016. 翻译史研究:不囿于文学翻译——《中国翻译家研究》前言[J]. 上海翻译(3):1-8.
- 高玉霞. 2016. 制度化翻译视域下的译者行为研究——兼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J]. 中国外语研究(1):126-132.
- 梁实秋. 1936. 霍斯曼的情诗[G]//文学的纪律. 北京:商务印书馆:110-118.
- 袁筱一. 2021. 翻译的历史与翻译的地理[N]. 文汇报, 2021-08-27.
- 查明建. 2004. 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 [J]. 中国比较文学(2):86-102.
- 周领顺. 201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 2022a. 译者行为研究的人本性[J]. 外语研究(2):78-83.
- 周领顺. 2022b. 译者行为批评“行为—社会视域”评价系统[J]. 上海翻译(5):1-7.
- 周领顺. 202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答研究者(之三)[J]. 外国语文(1):84-96.
- 周煦良. 2007a. 周煦良文集:卷 1[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周煦良. 2007b. 周煦良文集:卷 3[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Translator's Role Shifting and Translation's Socialization: A Study of Zhou Xuliang's Translator Behavior

MA Dongmei

**Abstract:** In the first period of his translation, as a poet, Zhou Xuliang mainly translated western poems with the method of attaining utility while seeking truth to serve the need of constructing of Chinese new poetry. In the second period, showing the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s, he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with the strategy of conventional transl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works with non-conventional strategies to serve the need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third period, highlighting translators' linguistic nature, Zhou Xuliang employs the strategy of deep translation to serve the need of socialism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ranslator's role shifting; translation's socialization; Zhou Xuliang

责任编辑:陈宁